

乾隆宏願 法寶明珠——《清文全藏經》

胡進杉

自東漢初年佛教傳入我國後，很快地受到國人的歡迎與接受，不但廣為漢族士庶所信仰，其他的少數民族群眾亦是五體投地頂禮膜拜，造寺、建塔、開鑿石窟等佛事常被許多少數民族帝王貴族用來祈求功德，而翻譯佛書雕刻藏經，也被當成國家的大事。在譯刻佛經方面，有的是刻印整部的《漢文大藏經》，如遼朝刻的《契丹藏》、元朝刻的《弘法藏》，有的是將其他語種的大藏經翻譯成自己民族語文的大藏經，如西夏國所譯的《西夏文大藏經》、元朝所譯的《蒙文大藏經》，本文所談到的《清文全藏經》也是其中之一。

滿族入關前，就已接觸到漢傳和藏傳兩系佛教，並開始翻譯滿文佛經，史載清太宗時的達海，曾師事藏傳佛教僧人幹祿答兒罕囊素，並譯出大乘經一種。定鼎中原後，隨著對佛教信仰的加深，也先後譯出了不少的滿文佛典，僅乾隆九年編輯完成的《秘殿珠林》，其卷二

十四〈供奉經典目錄〉，就收錄了《無量壽智經》、《心經》、《白傘蓋經》、《綠衣救度佛母經》等十餘種，二十八年又譯出《楞嚴經》，但大規模有計畫的翻譯則要數《清文全藏經》了。

《清文全藏經》全名《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又名《國語大藏》，俗稱《滿文大藏經》。「御製」指奉皇帝敕命而製作的；「清文」即滿文，滿族入關建立了清王朝，成為統治階級，把原屬於本部落的語言「滿語」，訂為清朝的官方語言「國語」，部族的文字「滿文」訂為官方的文字「國文」、「國書」，所以滿語又稱「清語」，滿文又稱「清文」、「清字」；「翻譯」指這些佛典是透過翻譯而非新著；我國佛教典籍的總匯，傳統上叫做「大藏經」，又稱為「眾經」、「一切經」、「經藏」、「藏經」或「大藏」，有時也簡稱為「藏」，並未見有「全藏經」一詞，它是乾隆所獨創，高

宗認為大藏經原只有藏文譯本、漢文譯本、蒙文譯本，今滿文譯本告竣，如是「四體大藏全備」，故名「全藏經」。因此，《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可以說是奉皇帝之命用滿文翻譯的佛教經典的總集。

爲什麼要翻譯《清文全藏經》？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的《清文繙譯全藏經序》，高宗說「蓋梵經一譯而爲番，再譯而爲漢，三譯而爲蒙古，我皇清主中國百餘年，彼三方久屬臣僕，而獨闕國語之大藏，可乎？以漢譯國語，俾中外胥習國語，即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不亦可乎？是則朕以國語譯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又據《嘯亭續錄》的記載：「乾隆壬辰（三十七年），上以大藏佛經有天竺、番字、漢文、蒙古諸繙譯，然禪悟深邃，漢經中咒偈惟代以翻切，並未得其秘旨，清文句意明暢，反可得其三昧，故設清字經館：繙譯經卷。」綜合這兩段記載，有二個值得探討的地方，首先乾隆認為佛經的翻譯，是先從梵文譯爲番文（藏文），再譯爲漢文，三譯爲蒙文。這種藏文佛經早於漢文的看法並不正確，按照佛教傳播的過程及譯經的史實，上述三種譯本的佛典以漢文爲最早，西元一世紀東漢明帝時就已譯出《四十二章經》，其後佛經漢譯的速度更加快捷，數量更多。到了唐代已形成五、六千卷卷帙龐大的《漢文大藏經》。至於藏文佛經，則到西元七世紀中葉藏文創製後，始從梵文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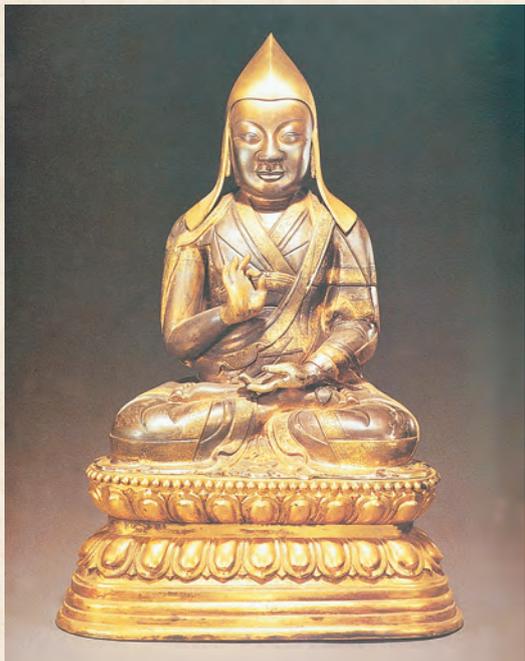
佛典，且在《藏文大藏經》中也有部份譯自漢文的；而蒙文佛經的翻譯始於十三世紀的元代，主要是依據藏文佛典再譯的。其次，譯印《清文全藏經》的目的有三：(一)、在清帝國中信奉佛教的滿、蒙、藏、漢四個民族中，除滿族外，其他三族都擁有本民族文字的大藏經，且入關後，清廷曾先後刻印過蒙、藏、漢三種文字的大藏經：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刻畢《蒙文大藏經》，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刻畢《漢文大藏經》，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刻畢《藏文大藏經》，而作爲統治階級的滿族，卻沒有帝國「國語」滿文譯成的整套大藏經，是不能以忍受的缺憾，因此《實錄》也認爲「揆之闡教同文之義，實爲闕略。」；(二)、想藉著對佛教的信仰，透過滿文佛典的閱讀，來推廣滿文滿語的學習。滿族未入關前，統治者鑑於金代的歷史教訓，對於滿文、滿語的未來，早有警覺，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四月，清太宗曾告戒諸貝勒，金熙宗和完顏亮廢棄祖宗衣冠儀度，循漢人之俗，服漢人衣冠，盡忘本國語言，終至亡國，他要諸貝勒應遵守祖宗之制，衣冠語言不可輕變。定鼎中原後，太宗遺孀孝莊太后亦以不忘滿語滿文叮嚀順治、康熙兩代皇帝。傳至雍正、乾隆，二帝也非常重視滿文、滿語的推廣，要求書寫正確，如文書中偶出現筆誤等小錯，也不放過，必在硃批中予以申斥或矯正。而滿文的整理和各種滿文書籍的編纂，也在乾隆朝達到最高潮，如乾隆六年

(二七四一)，爲了辨認和整理用無圈點老滿文書寫的檔案圖書，編了《無圈點字書》，爲了鐫刻寶璽官印，仿漢文篆字製成滿文篆書三十二種，爲了解決滿文著述和翻譯中使用詞語混亂的現象，對滿文進行了數次大規模的整理，並陸續出版了《欽定清漢字式》、《御製增訂清文鑑》等一批工具書，另外由於帝國版圖的逐漸擴大，各族人民相繼臣服，爲了促進各族文化的交流，及非滿族人民認識滿文滿語，也編纂了不少以滿文和不同文字對照的辭典，如《西域同文志》(滿、蒙、藏、維、漢五種文字)等，《清文全藏經》的譯印也是這個時代下的產物，以便讓治下的臣民經由閱讀《全藏經》，而知曉滿文滿語，能夠「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三)、漢文字詞較簡約深澀，而滿文則明暢易曉，更能表達梵文的原意。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成立翻譯《清文全藏經》的譯場組織，據全藏經第一函(名銜錄)的記載，計有總裁四人、副總裁三人、提調官五人、纂修官九人、收掌官七人、繙譯官七人、謄錄官二十四人、校對官十八人、閱經總裁一人、閱經副總裁三人、辦理經咒喇嘛四人、校對經咒喇嘛四人、總校僧人二人、講經僧人四人，總共九十五名滿、蒙、藏、漢四族官員僧人，但其中德慶、六十八兩人兼任二職，故實際參與的人數只有九十三人。這裡面四個總裁：和碩質親王永裕、多羅儀郡王永璇、大學士和坤、和碩額駙福隆

安，只是名譽職，真正統籌實務者有二人，一是主持簡別經典審核翻譯的閱經總裁扎薩克達喇嘛章嘉呼圖克圖伊施丹巴諄美，一是負責刊版事務的副總裁吏部尚書金簡，至於從事經典翻譯工作的則有給事中福伸、筆帖式占倫、和明、六十八、景琨、呼圖禮、托雲等七名翻譯官。

伊施丹巴諄美(ye-shes-bstan-pavi-sgron-me)，又名若必多吉(rol-pavi-rdo-rje)，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四大活佛之一，據現存北京故宮銀鍍金章嘉呼圖克圖像，他長的「長方臉形，鼻寬口闊，眉目疏朗，雙眼微眯，內含笑意，神态安詳，在像的右面頰下隆起一個很明顯的小包。」(圖一)清康熙五十六年(二七二七)正月十日生於甘肅涼州西蓮花寺附近，三歲時



圖一 章嘉呼圖克圖像 (清宮藏傳佛教文物 圖三六)

被認定爲二世章嘉活佛的轉世靈童，次年迎入佑寧寺坐床，成爲第三世章嘉活佛。雍正二年（二七二四）年僅八歲的章嘉，被送至北京，深得雍正皇帝的喜愛，命他依止土觀阿旺嘉措等駐京高僧，學習梵文、藏文和蒙文，攻讀梵藏佛教大師的佛學著作，並奉旨每日進宮與皇四子弘曆（即後來的乾隆皇帝）等共同學習滿漢文化，因其資質優異，奮勉勵學，到了十八歲，已精通滿、蒙、漢、藏、梵五種語文，熟諳顯密典籍，成爲一位博學多識的佛學家和語言文字學家。他廣宏佛法，曾被雍正皇帝封爲「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賜金冊、金印。雍正十二年，奉命前往泰寧拜見七世達賴喇嘛，並護送其返回拉薩。翌年十月，抵達後藏扎什倫布寺拜見五世班禪，從他受比丘戒。後接到雍正駕崩的消息，匆忙返京，朝見新繼位的乾隆皇帝，乾隆封其爲「掌印喇嘛」，掌管駐京喇嘛事務。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賜「振興黃教大國師之印」，二十年外蒙發生青衿咱卜撤譯之變，章嘉除致書哲布尊丹巴外，並親自前往處理，迅速平息此事件。二十二年，七世達賴圓寂，奉旨入藏委任攝政及主持認定達賴轉世之事宜。四十五年，六世班禪晉京慶賀乾隆皇帝七十壽誕，章嘉擔任翻譯並負責班禪在京的活動事宜。五十一年圓寂，四年後《清文全藏經》才全部告竣。一生著作和譯著甚多，主要有《欽定同文韻統》、《諸佛菩薩聖像贊》、《喇嘛神像集》等，並曾主持將藏文大藏經的《丹珠爾》譯爲蒙文。

金簡（？—一七九四），滿洲正黃旗人，金佳氏。初隸內務府漢軍，乾隆中授內務府筆帖式，三十七年遷至總管內務府大臣，曾監武英殿刻書，充四庫館副總裁，專司考核督催，又命纂修《四庫薈要》，改譯遼金元三史地、人、官名，以三史國語解重加編次，五十七年調吏部尚書。《全藏經》譯雕伊始，即受命爲清字經館副總裁，辦理刊版事務。

由《上諭檔》及《實錄》有關資料，清字經館的工作首先「將藏經所有蒙古字、漢字兩種悉心校覈。」同時章嘉國師也去比較漢文、藏文二種大藏經，前一項的工作在於參考蒙文佛典以便解決佛學名相的滿文譯語問題，後者則是斟酌挑選擬譯的經典清單。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諭旨也規定：「繙譯官每人每月繙經一卷爲數較少，嗣後每人每月著繙經二卷。」並且每譯畢一卷，即令章嘉審正進呈，恭候皇上聖裁。在《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中有一段記載，詳細描述了滿文佛經翻譯的情形：「文殊大皇帝（按：即乾隆皇帝）認爲，自己出身的滿族人口眾多，對佛教獲得信仰者也爲數不少，但是語言文字與別族不同，以前也沒有譯爲滿文之佛教經典。若將佛說（甘珠爾）譯成滿文，實在是造福於後代之善舉，遂命章嘉國師將《甘珠爾》譯成滿文。從學府中成績優異人員和在京喇嘛中選擇通曉語言文字者，與幾名學識精深的和尚一起開始翻譯經卷，每譯完一函，由章嘉國師詳加校審，逐卷進呈皇上審閱。皇上在審閱中又更正其中一些

有疑惑及不妥當之處。皇上悉心審閱後，還要作譯記，因此經過多年，始告全部譯成。大皇帝是統治天下轉大力法輪的君主，自然需要勤於政事，他如處理國政一樣地不但詳閱《甘珠爾》經，而且能推敲句意，加以訂正，如此行止，實乃大智大聖者之功業也。他將佛法當作眾生的利樂根本，極其重視翻譯佛經，使公正

之人莫不油然而生敬仰之意。」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清文全藏經》終於譯印完畢，裝帙形式為貝葉裝（圖二），這種形式源於印度的貝葉經，我國的藏文大藏經和蒙文大藏經也都採用這種形式。每部一百零八函，每函上下各有二層護經板，外層經板為朱漆描金之木板，寬二七·五公分、



圖二 貝葉裝



圖三 外層護經板 木胎朱漆描金，上繪八吉祥圖案，由左至右為：勝利幢、金魚、寶瓶、蓮花、右旋白螺、吉祥結、寶傘、金輪



圖四 內層護經板 黃綾上繡七彩龍紋及摩尼寶珠



圖五 內層護經板佛菩薩像及滿文經咒新字禮敬文與經題



圖六 上內層護經板佛菩薩像左圖法稱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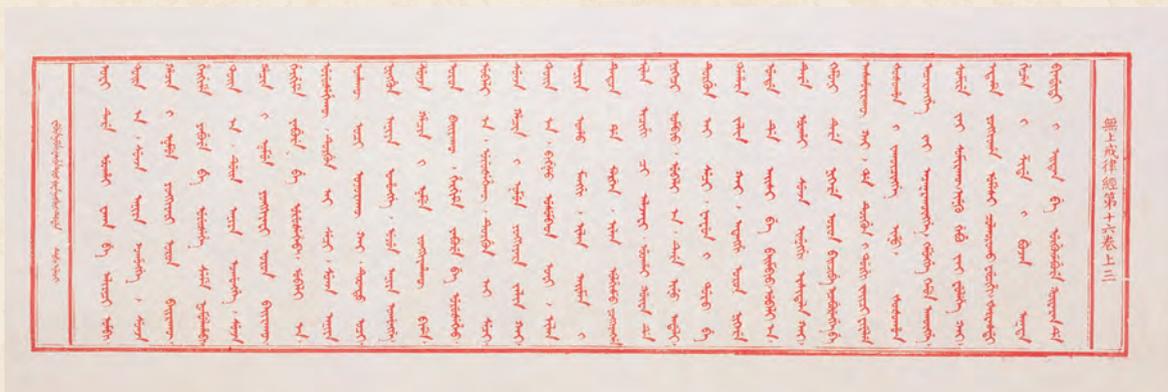
圖七 上內層護經板佛菩薩像右圖神通王佛

長七七·五公分、厚三·五公分，正面中央由左至右以金漆描繪佛教八吉祥圖案：勝利幢、金魚、寶瓶、蓮花、右旋白螺、吉祥結、寶傘、金輪（圖三），反面無任何圖案。內層經板寬二四·六公分、長七三·七公分、厚二公分，為木胎板，以黃色織錦袿襪（圖四），反面依次覆蓋紅、金黃、朱黃三色經簾，上內層經板經簾下左右佛菩薩像各一尊，中漆墨藍色，泥金浮雕數行「滿文經咒新字」，如第一

百零八函首三行譯寫梵文「頂禮佛、頂禮法、頂禮僧」（*namo buddha ya, namo dharmā ya, namo saṅgha ya*）禮敬文，後為本函《無上戒律經》的梵文經題（圖五），左圖為「法稱佛」（*dharmakīrti*）（圖六），右圖為「神通王佛」（*abhiñānātāja*）（圖七），下內層經板經簾下彩繪四尊或五尊護法神像，本函繪有四尊天女像，自左至右依次為八吉祥天女中的持羅天女（*śaṅkha-devī*）、吉祥結天女（*śrīvasta-devī*）、



圖八 下內層護經板護法像 由左至右：持羅天女、吉祥結天女、執幢天女、持輪天女



圖九 《清文全藏經》經葉 朱墨雙面刷印，每面三十一行，行文由上至下由左至右

執幢天女 (dhvaja-devi)、持輪天女 (cakra-devi) (圖八)。上下經板之間為經文，每函二百餘葉至五百餘葉不等，每葉高二四·三公分、寬七·三公分，朱墨兩面刷印，每面三十一行，版框高一五·七公分、寬五八·九公分，四邊粗細雙欄，左右各一框欄，左刻滿文經名、卷數與葉碼，右刻漢文經名、卷數與葉碼 (圖九)。經文按頁碼依序疊齊，外塗朱漆，並繪八吉祥圖案，目的在於美觀及防止經葉顛倒錯置，其外以經繩捆紮，再以三層黃色紅色被袂包裹 (圖一〇)。第一函的卷首附有 (1)、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的御製序 (清文繙譯全藏經序) (manju hergen i ubaliyabuha amba g'anjur nomun i šutucin.)、(2)、負責譯刊《清文全藏經》工作人員的〈名銜〉 (gebu jergi.)、(3)、〈御譯大藏經目錄〉 (han i ubaliyabuha amba g'anjur nomun i uheri šo sohon.)，此三篇文章皆各以



圖一〇 《清文全藏經》全函配件 捆經繩、被袱、黃色護經板、經葉、紅色護經板

滿、蒙、藏、漢四種文字分別刻印。

《清文全藏經》是根據《漢文大藏經》翻譯而成的，至於是全部翻譯或選擇翻譯，清字經館設立之初，章嘉曾如是向乾隆建議「唐古忒甘珠爾經一百八部，俱係佛經，其丹珠爾經內有額訥特珂克（按：即印度）得道大喇嘛等所傳經二百二十五部。至漢字甘珠爾經，則西方喇嘛及中國僧人所撰，全行列入，今擬將大般若、大寶積、大集、華嚴、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經，及大乘律全部翻譯，其五大部支派等經八種，並小乘律，皆西土聖賢撰集，但內多重複，似應刪繁就簡。若大乘論、小乘論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後代祖師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無庸翻譯。」這意見得到乾隆的批准。依據這個建議，《清文全藏經》翻譯的原則有三項：(一)、漢文大藏經中屬於大乘經的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大部，屬於小乘經的中阿含，以及大乘律全部翻譯；(二)、五大部外等重單譯經、小乘律、西土聖賢撰集，刪繁就簡，選擇翻譯；(三)、論藏全不翻。但實際的情形又如何？若據《御譯大藏經目錄》予以統計歸類，《清文全藏經》共收佛經七百二十九部二千三百五十二卷，這七百二十九部佛典與乾隆三年雕造的漢文大藏經《龍藏》目錄詳細比對，除了《吉祥屍陀林莊嚴殊特本續經》、《妙輪上乘秘密不思議大教王經》等十三部譯自《藏文大藏經》外，餘七百一十六部均出自《龍藏》，現將其編輯的體例與收錄經典的部數和《龍藏》列表比較如後：

《龍藏》		《清文全藏經》	
目次	收經部數	目次	收經部數
1.大乘般若部	十九	1.大乘般若部	二十*
2.大乘寶積部	三十七	2.大乘寶積部	二
3.大乘大集部	二十六	3.大乘大集部	十三
4.大乘華嚴部	二十六	4.大乘華嚴部	九
5.大乘涅槃部	一三	5.大乘涅槃部	七
6.大乘五大部外重譯經	二百五十	6.大乘五大部外重譯經	九十二
7.大乘單譯經	一百六十六	7.大乘單譯經	一百六十一
8.小乘阿含部	一百三十七	8.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	二百一十四
9.小乘單譯經	一百零二	9.西土聖賢撰集	七十二
10.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	三百	10.小乘阿含部	十八
11.大乘律	二十五	11.小乘單譯經	一百零一
12.小乘律	五十九	12.此土著述	一
13.大乘論	九十三	13.小乘律	六
14.小乘論	三十七		
15.宋元續入藏諸論	二十三		
16.西土聖賢撰集	一百四十七		
17.此土著述	二百零九		
總計一千六百六十九部		總計七百一十六部	

* 《大般若經》，《龍藏》作一部，《清文全藏經》作十六部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清文全藏經》所譯經典部數不到《龍藏》的一半，而卷數則約為七千二百四十卷，《龍藏》的三分之一，我們再比對上文所提的三原則：(一)、全部翻譯的品類，大乘經五大部並未全部翻譯，但各部重要的經典，如般若部的六百卷《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寶積部的一百二十卷《大寶積經》、華嚴部的四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涅槃部的四十卷《大般涅槃經》、大集部的《大方等大集經》均已譯出，小乘阿含部，不只譯出六十卷《中阿含經》，也譯出五十卷《增壹阿含》、五十卷《雜阿含經》、二十二卷《長阿含經》，整個阿含部四阿含的主要經典均已譯出。至於律藏方面，大乘律一部也沒有譯出，而實際上只譯小乘律。這可能是章嘉一時的口誤，但實質上更合乎「佛旨」，因漢文大藏經律藏的「小乘律」，是佛陀創立僧團時所製，在第一次結集時就已誦出，而「大乘律」則是到了大乘中期，為了與小乘三藏相對應，及滿足出家人大乘行人修持的需要，才將大乘經和大乘論中有關的大乘律儀抽出，編集成單行本，逐漸形成大乘「律藏」。而在戒定慧三學的修持中，也以小乘律為主，此外所譯出的六部小

乘律，只相等於漢文的《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和《解脫戒本經》。其他如六十五卷的《十誦律》、六十卷的《四分律》、二十卷的《五分律》等重要律典都沒有譯出，無疑的是受藏傳佛教律學傳承「根本說一切有部」(sarvastivāda)的影響，在藏文大藏經的「戒律部」(vdul-ba)，主要的也是「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典；(二)、選擇翻譯的品類，從所翻譯的細目，可歸納成二種情形，(1)、五大部外的重譯經，選擇流通較廣的漢譯本翻譯，如《龍藏》中的《金光明經》有三種異譯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金光明經四卷》、《合部金光明經八卷》，只選擇義淨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法華經》也有三個譯本：《妙法蓮華經七卷》、《正法華經十卷》、《添品妙法蓮華經八卷》，也只選擇鳩摩羅什的《妙法蓮華經七卷》一種等等；(2)、「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及「西土聖賢撰集」，所選擇的都偏重在密教經典及其儀軌和成就法，而從藏文加譯的十二部經中，也以密續 (rgyud) 居多，這無疑是受藏傳佛教注重金剛乘的影響；(3)、大小乘論藏，如章嘉所奏，均不翻譯。此外，在收錄聖賢集傳時，「西土聖賢撰集」收錄七十二部，「此土著述」只翻譯《釋迦譜》一種，明顯摒除漢僧的所有著作，至於在全藏的最末編錄《聖修行願經》等三部誓願吉祥偈，這也仿自藏文大藏經的體例，以為圓滿一切現世和究竟利益之用。因此，《清文全藏經》是以漢文大藏經作為翻譯的底本，編排的體例也仿自漢文大藏經，但選

譯經典時則參考了藏文大藏經(甘珠爾)(bkav-kyur)的內涵，且由於滿蒙二種語文系出同源，本藏滿文的語法和辭彙也大量借鏡了蒙文佛典的譯法，因此《全藏經》是漢藏蒙文三種大藏經的組合，而且如章嘉所說這些選擇的經典是最合乎「佛旨」的，它們不管是轉譯自漢文大藏經或藏文大藏經，除了《釋迦譜》是齊·僧祐的著作，都是源於梵本的再譯本，這種合乎佛旨的「佛陀教敕的譯本」，亦即藏文「甘珠爾」一詞之意義，所以《清文全藏經》的滿文標題也稱為《滿文翻譯大甘珠爾經》(manju hergen i ubaiyabuha amba g'anjur nonun)。

上述《清文全藏經》「刪繁就簡」的翻譯原則，以及只譯經、律的考量，可能與乾隆的年事已高有關，清字經館設立於乾隆三十七年，當時高宗已六十二歲，若將七千多卷的《龍藏》全數翻譯，不但曠日費時，乾隆也怕生前無法看到，這在他的〈御製序〉中也明白透漏此消息：「為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予所舉之大事多矣，皆賴臬乾默佑以致有成；若夫訂四庫全書及以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胥舉於癸巳年六月之後，既而悔之，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而所譯漢全藏經又畢載。夫耳順古希已為人生所難致，而況八旬哉，茲以六旬後所勅為之典，逮八旬而得觀國語大藏之全成，非臬乾嘉庇，其孰能與予斯。」感激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清文全藏經》與《四庫全書》是乾隆晚年的二大文化工程，它以漢文大藏經為底本，對比蒙文藏經翻譯而成，由於章嘉兼通梵藏滿蒙漢文，熟悉經典，且有蒙文辭彙和經典可以借鑑，所以如此龐大的工程得以在十幾年間大功完成，殊屬不易。其譯法多採直譯，譯文也頗為講究，有所依據的原文是偈頌體時，也往往用滿文的詩偈格式予以翻譯，如《聖修行願經》是一部譯自藏文的佛經，原文是偈頌體，每頌四句，每句九個音節，滿文也是每頌四句，每句押頭韻，且第四句的句尾，與其它各頌第四句的句尾，均押同樣的尾韻。

由乾隆所主導，徵集近百位滿蒙藏漢僧俗精英所譯雕的二千餘卷《清文全藏經》，雖竭盡所能達於至善，但難免微有瑕疵：(一)、全藏數量龐大，從翻譯經文到刊刻刷印，確是件繁重的工作，或由於寫刻的疏失，或刷印的不清晰，或校對不夠確實，而產生筆誤、錯別字、漏譯、佛學名相前後譯語不一致，及一些不準確的譯法等缺憾；(二)、論藏沒有翻譯是一大損失，有人說翻譯不只是原文的複製，更是對原文的解釋，在大藏經中，論藏所闡述的佛教義理無疑是最深奧和最有意義的，如果當時也翻譯了論藏，則我們更能夠了解當時佛教學者對漢傳佛教教義的看法與認知；(三)、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十六日曾諭令：「幹珠爾經之末尾篇頁，著不必書寫繙譯姓名。」因此《清文全藏經》中每部滿文的結尾都沒有記錄翻譯者的姓名與譯記跋語，以至今日我們無從考察那部經由什麼人翻譯，那個人又譯了那些經典，翻譯

的過程又如何，對於滿文翻譯史及佛經翻譯史的探討實是一大損失。雖然如此，但瑕不掩瑜，《清文全藏經》的價值有二：(一)、文物價值，現有的兩部全藏經，是海內僅存的珍本，從版面的考究、裝潢的富麗、製作的精美，體現了清代印刷刻書的高峰；(二)、文獻價值，在《龍藏》和《藏文大藏經》中都能找到滿文翻譯的原典，譯文與其是否完全一致，或是所根據的底本異於入藏的本子，是版本學上值得研究的課題，其次清代雖然編了數十種滿文字典工具書，但所收的辭彙絕大多數是歷史、政治、財經之類，佛學名相的辭彙少之又少，而為了翻譯全藏經，勢必創造許許多多的佛學辭彙，若能將其搜集匯總，可裨補前人之不足。

《清文全藏經》的經版均為梨木刻成，全部共四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塊，初存於清字經館，後該館改為實錄館，乃移其經版於五鳳樓。乾隆五十五年當全藏經完成不久，因西華門內清茶房外果房於五月十日失火，延燒存放經版的經卷間，燒燬七千六百餘塊經版，其後或毀或失，時至今日，遺存北京故宮的經版尚有二萬五千八百六十二塊。當時共刷印十二部，分藏京師、盛京、前後藏各處寺院，之後再沒有補雕續印的記載，現僅存二部，一部的七十六函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另三十二函存於本院，另一部則完整保存於拉薩的布達拉宮，據傳去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擬將這批經版清洗修復，不足之處則補以布達拉宮所藏，採用傳統工藝，重新刷印二十部。